

丁佩玉

個人簡介

1919 年生於廣州，祖籍潮州豐順。少時就讀廣州市市立六十九小學，初中升讀遠東中學。畢業後，考進廣州市婦女幹訓班，並加入幹部訓練班，接受軍事及師資培訓。十九歲被派往兒教院第六院執教。1944 年結婚，次年隨一六零師回廣州，與丈夫在大登當教員。1950 年，赴港生活。

童年生活

1919 年，我在廣州出生，鄉下在潮州豐順，後落籍廣州市番禺。小時候，住在小北登峯路，房子很大，有三廳兩廊。由於爸爸三兄弟沒有分家，我們三十多人住在一起，非常熱鬧。我有三個大哥、兩個弟弟，還有一個妹妹，共七兄弟姐妹。

我開始讀書，就是念小學，沒有上過私塾。少時我跟爸爸說：「老寶，我想讀書。」¹父親說我想讀就讀吧。他既然同意了，我就可以上學了。當時家裡姐妹多，姐姐沒有讀書，如果只有我能讀書，則不太公道。後來爸爸決定我跟姐姐一起讀書，不料姐姐認為自己年紀大，不能再上小學，所以放棄了。最後，我就和弟弟一起讀，那年我十一、二歲，念到約十六歲才畢業。

小學

我在廣州市市立六十九小學念書。學校位於小北，是六年制的男女校，很出名的。我們不穿校服，平時只穿便服，及家裡自製的布鞋。同學皆有一個藍色的布書包，用來攜帶日常所需，我們也可以在教室的抽屜裡放置自己的物件。至於文具，我們多數會用鉛筆，有時也用毛筆，但沒有墨水筆。

讀完小學一年級，就直接升上三年級，因為老師說我程度不錯，可以跳班，所以我只讀了五年小學。小學科目有古文、算術、國語、音樂和尺牘等。我最喜歡算術，後來也成為了算術老師。六年級時，我讀過英文，學過二十六個字母，中學時又讀過一遍。上體育課時，我們會打球，多是排球。我活潑好動，擅於運動，喜歡打排球、乒乓球和踢毽子。人家說我身體好，皆因我運動好。大概六年級時，我們在廣州市運動場進行排球比賽。人家要拿票才

¹ 老寶為廣東俗話，指父親。

可進場，而我們是運動員，不用拿票，非常威風。那次經歷十分難忘，記得評判員王先生很偏心，對方犯規，他不處罰，反而罰沒有犯規的我隊。最後，我們輸了，很不服氣。當時對方一起喊口號，感謝王先生偏幫他們——一、二、三，多謝王先生！我們聽到後，十分憤怒。

小學時，我對潘老師和盧老師印象深刻。潘老師教自然科，盧老師則是三年級班主任。我平時叫盧老師為「肥佬」，但他對我們很好。有一次，我們打乒乓球，我打贏了他，他對我說：「丁佩玉，我真失禮，打乒乓球輸零蛋給你。」²六年級時，潘老師帶我們全班同學去殯儀館。那是我小學時最難忘的經歷！我們到了殯儀館，便說：「走了，走了！」潘老師卻說我們要認識自然，也要知道人體是怎樣的。我看見臥在棺材的屍體，嚇得要死！潘老師很有學問，他兒子也在我們學校讀書。他兒子很喜歡我，大家曾有兩次書信來往，不過後來失去聯絡。當時每位老師對我都很好，學習生活很愉快。1935年，我小學畢業。我們有畢業典禮，也獲發畢業證書，可惜後來遺失了。

小學畢業後，我跟父親說想繼續讀書。父親說不行，因為不能偏心。母親卻說不用父親給錢，她會供我讀書。小時候，母親大哥在廣州市沙河掛牌行醫，賺了很多錢，然後把錢到處掉，母親拾起後，把錢存起來。所以，母親給錢我，讓我到遠東中學讀初中一年級。學校是男女校，位於小北。中學時，我學會英文，也認識更多更深的知識。但我在那裡讀書時間不長，對學校感情也不深。

婦女幹訓班

中一暑假時，我得悉婦女領袖陳明淑的廣州市婦女幹訓班招生。陳明淑是陸宗騏的太太，而陸宗騏是第四科科长。我們考試後，便可加入幹訓班。那時天還沒亮，父親就陪我去小北的北院考試，然後在茶居等我。我不記得考試的內容了，只記得考官在面試時問我一些生活問題。最後，我獲取錄了。我當時大喊：「有了，我有名呀。」父親就說可以了，到時入班就是。

加入幹訓班的頭兩個星期，我不習慣離家和在外留宿，因而經常哭。至於培訓方面，就是操練和軍訓，一般我們要穿制服，戴軍帽。到了第三個星期，我們放假回家。一天後，又回到幹訓班。有一次訓練時，日本仔忽然來了，隊長說：「你們誰跟我北上從軍？」那一年，我十七歲，滿腔熱血，想為國家、為民族出力。回家後，我把此事告訴父母，父親主張我去，

² 此處未能確定是盧老師或潘老師，按上文應為盧老師，受訪者的記憶是潘老師。

母親則捨不得我走。大哥說：「對，很辛苦才把你養育成人，現在說走就走。」大哥這樣說，是因為他疼我，捨不得我離開。

北上從軍那天，我挽著書包一邊走，一邊回望家人，大家依依不捨。陸宗騏夫婦倆帶著我們十幾人離開廣州，前往蘆包、英德。幹訓班大概有五、六百人，北上的只有十幾人，畢竟她們都離不開家。

在蘆包，我們坐船去韶關。我們的關係很好，那時跟著陳明淑，她吃甚麼我就吃甚麼，她吃雞我就吃雞，她吃鴨我就吃鴨。記得大家還一起吃過果子狸呢。說起來，幹訓班每月有十塊零五毛的生活津貼，那時候十塊錢已經很多了。

在連縣，我們跟著陸宗騏訓練。記得當地村民喜歡拿著煙斗「咚咚咚」地抽水煙，我們到村民家裡，一進門就嗅到那陣煙味。那時我只知道日本仔侵略我們，但具體戰況並不清楚，大家都說日本仔很壞，經常抓「花姑娘」。³戰後我回到家中，姐姐跟我說，很多婦女都被日本人侮辱過，如果我沒有走，恐怕也會遭害。

我們後來在連縣坐貨車，由於人多，車內非常擠逼，我們只好把行李放在貨車上面。怎知途中被日軍飛機追擊，貨車左閃右避，如有閃失，就會掉到山坑去。幸好司機技術了得，貨車終於駛離山坑邊，我們總算逃過大劫，但是貨車不小心撞到公路另一邊的圍牆，有些乘客的頭部受傷了，要到醫院治理。我比較幸運，不用入院。

往韶關途中，我認識了社會音樂家黃友棣，那時他還沒進兒教院。⁴黃友棣與趙輝都是音樂家，彼此很要好。那時，我們和黃友棣一起前往英德，在差不多到達英德的時候，日本飛機突然投放炸彈，把趙輝炸到粉身碎骨，肢體支離斷折。黃友棣看見他死得那麼慘，整整一個星期不沖涼、不洗臉。我們可真命大！

我是幹訓班中班的，畢業後，廣東省李漢魂主席幹部訓練班在韶關舉行招生考試，陳淑明鼓勵我們去應考。她叫我們離開婦女隊，因為她想訓練新一批婦女。於是，我們分成三隊，第一隊報考婦女生產組，我們第二隊報考幹部訓練班。那時只要稍為識字便可應考，工作主

³ 花姑娘，指年青漂亮的小姑娘。

⁴ 受訪者表示黃友棣先生在連縣做兒教院音樂老師的時候，她還在李漢魂的幹部訓練班。

要是訓練婦女，教她們手工和一些婦女工作。當時婦女並不識字，故要我們教導。

我們考進幹部訓練班後，知道第一中隊是燕塘畢業的女同學。考試時，我們要考常識，考完就等放榜。放榜時，我們看街上的通告，便知道自己是否獲取錄。那時取錄的，大學生一隊，我們中學生一隊，還可以按個人興趣，選醫學訓練班或軍事訓練班。我喜歡軍事，就選了軍事訓練班。那時我離開陸忠祺，到了幹部訓練班。

幹部訓練班

我們每班約有一百人，幹部訓練班的生活很有規律。早上天還未亮，就有人吹哨子叫我們起床，起床後要馬上穿鞋子、綁腳綁和摺好被子。吃飯前，要聽哨子的指揮——聽見哨子響，便吃飯；哨子再響，就趕緊收拾碗碟，不管吃飽沒有。經此訓練，我們逐漸培養了自律和自理能力，所以日後在兒教院的比賽中，我們總拿第一名。

膳食方面，我們通常會吃大芥菜和米飯。訓練班的糧食還是足夠的，反而兒童教養院的不足夠。我們要進行軍事訓練，從中認識戰爭和了解日本侵略的情況。我們整天在營裡，一個禮拜放一天假，生活非常沉悶。訓練不算太辛苦，但洗澡問題則令人十分困擾。我們幾天才洗一次澡，水是冷冰冰的，平日只用毛巾洗臉就算。但我對此很不習慣，有些人不怕冷，就「咚」的一聲跳進水裡，然後擦身洗澡。當時的日子，就這樣一天一天熬過去。

在幹部訓練班，我對阮戈印象比較深。她是來自上海的女強人，以國語授課，還要我們速記。最初我不會，就向那些學問好的同學借筆記來抄。那時侯，生活很好玩，也開心！我們又會到不同的地方訓練，記得有一次在樂昌，最後那次就在連縣，每個地方的訓練都不同。阮戈是我們在樂昌時的隊長，像她那種主任級和隊長級的人，還要接受訓練。記得她每次去重慶訓練，都會遲到。阮戈說：「我不能穿裙子，要穿褲子，否則我就會拉肚子啊！」她騙那些人，讓他們給她穿褲子，但實情是她穿不慣裙子。她長得高高的，而且為人堅強，沒有半點女人氣質。人家說行軍辛苦，但她還可以拿一塊大石頭，一邊行軍，一邊打拍子給我們唱歌，真厲害！我們很佩服她，她對我們要求都很嚴格。那時我們把槍放在肩膀上，經常會不知不覺地掉下來，一旦掉到地上，我們就會被罰。

在訓練過程中，最難忘的經歷是我們經常要把一些人送去打靶。在吹號聲響起後，「嗒嗒——嗒嗒——」，我們十分害怕。當時不知道為甚麼那些人要被拉去打靶，聽說有些好像因

為抽煙，大膽的同學會走去看打靶，但我不敢看，單是聽到「打靶」二字，就已經嚇死了。別人回來說給我聽，得知那些人活活地被打死，然後被堆在地上，讓人心寒！

我們離開阮戈的訓練班後，被派下鄉訓練婦女，後來再考進李漢魂的幹部訓練班，接受第二次訓練。一年後，我畢業了，剛好十九歲。李漢魂便派我們去廣東兒教院，過去有很多同學都被派去那裡，我們算是較遲去的。畢業前，我們接受了一些師資培訓，到了兒教院後，我們再跟有經驗的老師學習。

兒教院

我和謝嘉兒一起到兒教院，接手原來由別人負責的工作。我在那裡教了差不多六年書，李漢魂太太吳菊芳是兒教院院長，辦了十多個規模很小的嬰兒班和幼稚班。當時兒教院有七間分院，一間在韶關，我則住在南雄的六院。吳菊芳院長身材瘦小，曾與我們見面，但沒有參與培訓工作。李漢魂曾給我們訓話，他個子小小的，當時身上綁著橫帶，⁵不綁直帶，因為他說不到戰爭勝利，不綁直帶。李將軍很厲害，我挺尊敬他！吳菊芳院長說兒教院遵行四個字——家、校、營、場。它像學校，又像家庭；有營、場，即是軍事之地，又有工廠，可以織草鞋之類的東西。兒教院有院歌，是吳菊芳創作、黃友棣老師填詞。⁶我們早上一定唱院歌。另外，兒教院的粵劇團都很著名，由我們的同事陳魂主理。

我們有五個區，我進了第四區。我教小學二年級，當班主任，專教算術。因為我是新人，初時要請教其他教學經驗較豐富的老師。我和謝嘉兒很要好，但離開兒教院後，大家便失去聯絡。她為人斯文，與我不同，不過我們相處得很好，住同一間房間。我們還把床鋪整理得很漂亮，謝嘉兒在那兩、三個來自香港的教員面前，誇獎我整理床鋪的技巧很高，其他人是學不來的。她既有學問，頭髮又燙得很漂亮，我們都很羨慕她。我們在軍事訓練時，要剪男生的短髮，雷主任每次演講，都拉我上台，對同學說：「你們看看丁老師的髮型，你們要學學她呢。」

兩、三年後，我被編去教入伍班，共教了三班，對其中兩班印象特別深刻。第一班是來自香港的兒童。他們有些被遺棄在街上，沒有人管，後來被兒教院收留；有些因為家裡沒有

⁵ 這裡指將軍繫橫帶於腰，見《戰國策·齊策六》：「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，西有災上之虞，黃金橫帶，而馳乎淄澠之間。」

⁶ 此處該為丁女士誤記。兒教院院歌為黃友棣作曲，何巴栖作詞。參考《難忘的歲月》，關爾強編著，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，隔頁。。

能力照料，被父親送過來。我們有專人保護他們，大半年後便把他們送去韶關，不過這樣做很不容易，因為路途遙遠。那些香港來的學生，年紀有大有小，大的約十幾歲，小的只有幾歲。他們年紀相差較大，但我們也沒辦法。一年班時，有兩個老師負責教他們，讓他們先認識一下兒教院的生活，稍後再教課本內容。學生雖然講廣東話，但帶有不同的方言口音，例如台山人把吃豬說成「肴」音。

那時院方說我有訓練的知識，便派我去教他們。但我不懂方言，有些學生又常說粗口，⁷所以我教得很辛苦。當時我是怎樣處理說粗口的學生呢？他們說一個「刁」字，就要打五十下；說一個「媽」字，就要打一百下，但不是由我來打，而是叫他們自己打自己。學生打自己一下後，我就問：「應不應該打？」他們說：「應該！」我希望用這個方法教他們不要說粗口，後來真的沒那麼多人說粗口了。幾年前，有個學生探望我，我問是誰，他們就說是我的學生，就是不再說粗口的那個。他告訴我說戒了粗口，不再講了。由於我教好他們，所以雷主任後來又派我去教那班潮州兒童。那裡情況更糟，因為我雖然是潮州人，但不會說潮州話，只會聽。那些孩子的父母大都是當官的，但父母無法照顧他們，就把子女送來兒教院。他們從前吃慣了飽飯，但如今吃不飽，就坐在那裡哇哇地哭，哭得很淒慘！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把他們安頓好。當時我跟他們說：「如果你們吃不飽，我就跟院長、院主任反映一下，讓院方多給你們一點吧。」

那時物資供應不足，幸好美國寄來斜布，我們把它做棉襖，送給孩子們。學生穿的多是草鞋，兒教院有生產部，會織草鞋或生產布鞋。於是學生上身穿藍襖，下身穿長褲，腳穿草鞋，男女一樣。他們初進院時很頑皮，但經教導後，變得很乖，對我很好。我們老師很不容易得到一雙皮鞋。這樣想來，在幹訓班時還不錯，我們有錢買布鞋穿。

兒教院的生活是這樣的，早上七、八時起床，我帶孩子們到河邊洗臉，洗完後回來吃早餐，平日多數吃粥。接著上課，上完課就吃午飯，多吃大芥菜和米飯。我們很少吃肉，兒教院很久才殺一、兩頭豬，豬的內臟肯定是給學校主任吃的，我們沒份吃。有些學生會埋怨說為甚麼豬沒有腸的。我雖為老師，但吃、用其實跟學生差不多。

吃完午飯，下午繼續上課，有些生產組的同學會去種東西，直到五點多才放學。六院離河頗遠，船送米來時，學生負責把米搬回院舍。因為米很重，通常由個子大的學生負責運米。

⁷ 粗口為廣東俗語，指粗言穢語。

那時學生既要做功課，又要運米，挺辛苦的。

住宿方面，學生全部住宿舍，男女分宿。老師住的是兩人房，床很矮，沒有床架子的。學生睡雙層床，有床架子的。我們住宿環境不太好，木虱多得到處爬。兒教院沒有電，我們每天都吃「燭光晚餐」，晚上要點洋燭。此外，洗澡沒有熱水，所以我們經常帶學生去溫泉洗澡。那時叫同學下水，男的在一處，女的在另一處。

我的工資好像有一百零五塊，有些老師有一石米，我年紀最小，只有六斗米，全折成金圓券給我們。工資用光後，買東西便賒帳，但男士不時透支，結果買東西時不准賒帳；相反女士較有錢，吃東西時可以隨時記賬，待工資發放時再付。那時，我丈夫和同事去合作社吃東西，全是拿我的本子去記賬。發工資時，我才發現那些紀錄，非常生氣。我丈夫也是六院的，他教軍訓，大家是同事，我跟他認識了幾年便結婚。雖然我很獨立，有時很主觀，但跟同事關係很好，人與人之間，你對我好，我就對你更好。

離開兒教院

在兒教院一段時間後，日本人打到南雄。後來兒教院疏散，我和先生沒有跟兒教院走，而是和王泉夫夫婦一起跟一六零師走。那時，王泉夫夫婦是我們最好的朋友。1944年12月，我們一路由三南一路出發。⁸經過三南大雪山時，由於下大雪，輪胎被吸住了，車不能動。我們在山上，沒有甚麼衣服穿，大家非常寒冷。記得我們幾個人輪流穿一件棉袍，十分可憐！山上又沒有水，我們就靠吃雪解渴，沿途會生火煮飯，吃乾糧。幸好那時年輕，我們還能撐得住。一六零師的馬營長是我大哥的結拜兄弟，我們四人一起上山下山，有時走路，有時坐車，到惠州後就坐船。那時離廣州已經不遠了。

1945年和平後，我跟著一六零師，回到廣州。

回到香港

我們到廣州時，日本人已經投降了。我馬上回家，那時因為屋子是我們的，所以家人沒有離開。嘩，見到父親後，發現他的鬍子長了很多。我也見到母親和其他人，但我最疼愛的侄女瑞珍卻不在了。大家劫後重逢，悲喜交集，又笑又哭。

⁸ 三南指江西省贛州市的龍南、定南、全南三個縣。

回到廣州後，我曾去學校看看，見到兒教院的同事。後來他們也解散了。經同事介紹，我和丈夫在大登做教員，我做了一個學期。大登的人姓盧，我們在那裡的小學教書，平時則住在家裡。

我是在和平前一年，即二十五歲時結婚的，1950年我三十多歲，來到香港。初到香港時，沒有地方住，幸好遇到一個兒教院的學生。他嫂子做包租婆，⁹在九龍海壇街承包了一棟樓，有四、五個房間。那學生介紹我去，我以每月四十塊的租金租了一個房間。

初到香港，只有我丈夫工作。他在金鐘上班，每月有兩百一十元。但香港開銷很大，光是女兒讀書也要用兩百多元，所以我到工廠學縫衣，幫補家計。工廠的師傅問我會否用腳踏衣車？¹⁰我說以前在家裡學過，他才留我在那裡縫衣。後來我還學會用摩打衣車。¹¹

來香港後，我過著「手停口停」的生活。¹²不過住在九龍海壇街時，很多香港入伍班的學生來探望我。那個戒了粗口的學生，便是其一，他現在好像是九龍一家雜貨鋪的老闆。兒教院的師生關係很好，彼此照顧。當初在香港籌辦兒教院校友會，再聯絡廣州校友，那時我也有幫忙。那時我們想組織一個團體，大家一起去旅行和聚餐，後來又選了主席和管理帳目的會計。2009年，就是兒教院七十周年紀念的日子了。

⁹ 包租婆為廣東俗語，即女房東。

¹⁰ 衣車為廣東俗語，即縫紉機。

¹¹ 摩打為廣東俗語，即馬達。

¹² 手停口停為廣東俗語，指不幹活就沒飯吃。



丁佩玉 (2008)



丁女士珍藏兒教院紀念品